

張

謇

陈有清
著

江苏历史人物小丛书

江苏古

53

K825.3
65
2

張

謇

陈有清 著
江苏古籍出版社

BDS1/16

樞機之變動乎天地
衣被所及
遍我東南

設為序
校學
庫

多識鳥獸
草木之名

B546595

张 謇
陈有清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通泰印刷厂印刷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375 插页 2 字数 57,000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-11,000 册

ISBN 7-30519-096-8/K·43

责任编辑 胡多佳 定价：1.00 元

目 录

一、归籍南通.....	(1)
二、科场奋进.....	(6)
三、力主抗战.....	(10)
四、弃官回乡.....	(15)
五、开办纱厂.....	(21)
六、经营垦牧.....	(30)
七、创建师范.....	(36)
八、创办纺校.....	(46)
九、开设特种教育.....	(51)
十、兴办地方公益.....	(58)
十一、热衷立宪.....	(69)
十二、参与共和.....	(76)
十三、治理淮河.....	(84)
十四、国际交往.....	(90)
十五、五山长青.....	(94)

一、归籍南通

“首膺实业开新纪，独占琼林第一枝”。这是对清朝末年由状元而成为实业家、教育家的张謇最贴切的写照。

张謇的祖上，几辈子都是平民，在清代谓之“冷籍”。那么，他是怎么从一个贫家子弟高登状元榜首，又如何从封建王朝的命官走上资产阶级实业家的道路的？让我们还是先从他的家世和幼年说起吧。

张謇，字季直，晚年号啬翁，江苏南通人。张氏祖上原籍江南常熟，元末为避兵乱迁居江北。祖父张朝彦是个贫苦的农民，平日以耕种为业，荒时暴月兼以摇鼓卖糖聊助生计，后来入赘南通金沙镇上开店铺的吴家为婿，家道渐富。其父张彭年继承祖业，除了经营二十多亩土地外，还有十多个伙计操办瓷货生意。张謇是张彭年的第四个儿子，清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生，因承继祖母吴氏的香火，故幼年取号吴起元，乳名长泰。他天资聪颖，四岁在父亲的指授下即能将《千字文》朗读成诵。五岁入塾，十五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、五经。

张謇的父母，都是饱尝过生活辛酸的平民百姓，在那个社会里，要想改换门庭，摆脱受压迫的地位，

只有指望儿子读书做官。所以当张謇十六岁时，就积极为他参加科举考试而张罗。

我国的科举制度，自唐以来，且不说它在束缚人才、挑选方法上有不少弊端，就其本身的许多规定，也是赤裸裸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，“冷籍不得入试”就是其中的一条。所谓“冷籍”，在清代，即指三代没有做过官，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、举人之类的家族。张謇已是数世清贫，祖父张朝彦几乎连字都不识，哪能入仕做官？这种实实在在的“冷籍”之家，怎有资格进科场应考？眼看一年一度的“县试”将近，他父亲急得坐卧不宁，东奔西走，到处打听筹划，总算探得一个补救的办法：按官场世俗的惯例，在同族中请一个做官的人出来“认保”，再请同县几个廪生连环“派保”，才可以去应试。张彭年别无他法，就去与儿子的老师宋璞斋计议。

宋先生也早有所虑并愿意从中帮助，他介绍张氏父子与如皋县东乡丰利镇的张骊相识。

张骊，字世德。子名张鎔，孙名张育英。他是当地的大户之家，有籍在册，子弟可以应考。经璞斋先生搭桥之后，张骊乘侄子张铨新丧，便叫吴起元挽丁成礼，充作张铨的儿子，取名张育才，字树人，入了如皋籍。张彭年答应事成之后，以钱二百千^①相谢。

时至二月，张謇以张育才之名如期参加县考。临试之前，许多纨绔子弟华服翩翩，雄视古今，高谈

① 一千钱相当于一挂，当时通如习俗，以八百钱为一挂。

阔论。唯有他还穿着一身青布旧袍子，站在大门口的石鼓后面闷声不响。一连五场考了下來，张謇每场的成績都不错，心里稍觉宽慰。

四月间，他到通州赴考。原想节节向前，步步登高。谁料考过之后，成績都排在百名以外。璞斋先生闻讯大怒，严加斥责：“假若千人应考，取九百九十九人，可谓不难，但毕竟有一个落榜不取，你要把这个人看成正是你自己！”

张謇听罢悔恨交加，抹抹眼泪决心从头奋起。他在学馆的窗子上、桌子上，宿舍的墙壁上、帐顶上都写起“九百九十九”五个字。同时，睡觉时用两个青竹筒将辫子夹住。睡熟之后，只要头一偏，竹筒一滚，辫子便牵动头皮，一疼就醒了。醒来之后，灯一亮又处处见到这五个大字，好象宋先生严峻的面容就在眼前，在督促自己。于是他打起精神，以冷水洗面，重整衣冠，发奋苦读，常常耗油两盏，始得天亮。

入夏之后，天气炎热，中午他从不打个盹儿。晚上蚊虫叮咬，他就把两腿伸进空坛子里，坛口上再用围裙一围，仍然全神贯注地读书、练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张謇不仅中了秀才，而且学业日进，见识日增，在世人口中，获取了“江南男子”的美称。

张彭年言而有信，给张骐以二百四十千钱作谢，现金不足，连署卷也凑上了。谁知这张骐贪吝成性，不仅酒肉不离，连时新的洋药（鸦片）也吸上了。手头无钱，就向张彭年家索款，而且得寸进尺，殊求无已，逼得他们“家无宁岁”，在万分无奈之下，不得不

加以拒绝。这一来可惹恼了张翱，他把脸一翻，于同治十年(1871年)初夏，向如皋县教谕姜培南、训导杨泰瑛提出诉讼。姜、杨与张翱同气相连，发出签票，传令张謇到县衙听候处置。

张謇时年十九岁，于海门训导署读书，勤于功课，广交师友，正是学业长进之时，前程有望之期，猛听受人指控，胸中甚为愤慨，但别无他法，只好辞别师友，只身前往如皋。途中，他想起人情冷暖和前程未卜，长吁一声，随口吟出一首诗来：

纷麻经综更谁尤， 大错从来铸六州；
白日惊看魑魅走， 灵氛不告蕙荪愁。
高堂华发摧明镜， 楚路凋颜送客舟；
惆怅随身三尺剑， 男儿今日有恩仇！^①

张謇一到如皋，就受到严厉责斥，被暂时关押于学宫。姜、杨二人准备禀告上峰，进而将张謇革除“功名”，打入囚牢。消息传出后，张彭年非常着急，积极筹集金钱，上下打通门路。可他们家的亲戚都是升斗小民，哪能帮得了忙，就连宋璞斋先生也是爱莫能助。在这关头，张謇的一个好友挺身而出。这就是他的“同案秀才”、白蒲才子顾延卿。此人正直仗义，见朋友遭难，就东奔西走，串联挚友，筹措了一笔钱，打通了关节，使张謇得以借一个风雨之夜逃了出来。

这样的打击，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来说，无疑是一件奇耻大辱。但张謇并未因此消极气闷乃

① 见《占籍被讼将之如皋》。

至沉沦，相反地以此为动力，重新振作精神，继续奋进。正如他后来在师范学校训导词中所说：“下走自弱冠至今，三十余年中，受人轻侮之事，何止千百；未尝动声发色，以修报复；唯受人轻侮一次，则努力自克一次，以是至有今日。”又云：“进德之积分，则在不与世间腐败之人争闲气，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。”

冲出囹圄，得与一班好友相互切磋，张謇进步更快，不久移居南通。二十一岁时，经礼部核批，准予回南通直隶州注册入籍。从此，张謇心境宽畅，精力集中，攻读更为刻苦，学业由是大进。二十五岁时，他正式改用今名“謇”，取字“季直”。“謇”的本意是口吃，也有着忠诚、正直的含义。张謇以此字为名，表明了他做人的道德和价值观。

二、科场奋进

中国的科举之途，从秀才、举人到进士，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，多少人从童稚少年考到苍髯白头，甚至终身不第，落魄一生。张謇在这条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必由之途上，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。

张謇从小考到大魁，先后二十七年。岁试、优行试、考到、录科等十次（各处书院考试还不在于其内），加上乡试、会试、殿试共二十二次，先后在考场中渡过一百六十多天。时间不可算不长，用心亦不能不苦！他的成绩并不差，在这些考试中，考到第一名的有九次，考在前十名上下的有七次。但科举考试毕竟是统治者设置的象牙之塔，越往上越难通过。尽管举子多如牛毛，成功者却似凤毛麟角，再加上营私舞弊等等原因，张謇在几场关键性的考试中，如乡试、会试，往往连试不中。以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的第五次参加秋试来说，先前几次预考成绩都不错：五月的科试、优行试都考了第一名（贡元）；八月的总督、巡抚、学政三院会考，也取得第一名；可到九月再考，仍然名落孙山！直至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参加第六次乡试，年已三十三岁，才中顺天府南元^①。此后，三

^① 南元：清代顺天乡试，无论何省人均可参加，唯第一名解元例属直隶籍，第二名必属南方各省，故称“南元”。

十四岁、三十八岁、四十岁三次会试，也都没有考中。屡屡败北，不可能不折磨人的意志、动摇人的信心。张謇也曾一度灰心丧气过，“栖门海鸟，本无钟鼓之心；伏枥猿驹，久倦风尘之想”^①，但到头来他还得像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举子那样，拼搏于考场。

张謇始终保持着一颗上进心，尽管他在考场上也时遭挫折，但在学业上却不断有所进步。光绪五年的三院会试之后，担任副主考的总督沈葆楨，在病榻上曾托人传话给他：“做文章不可只学《班书》，要著重看《史记》。”张謇深受感动，奋力以补自己之不足，下功夫钻研太史公的著作，同时还学习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及历代各家名著，并大量阅读明、清地方志书，日积月累，博闻强记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张謇家里虽属晚清的小康人家，但并不十分富有，不可能完全依赖家里供养而闭门苦读。二十一岁那年，他即去担当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的文书，后来又随浦口淮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幕中任职。光绪八年六月至光绪十年五月间，又随庆军开赴朝鲜。在这些军幕生活中，有许多具体的军务杂事要他处理，琐碎繁忙。特别是那份受到朝野推崇的关于朝鲜时局问题的六点条陈，为吴督条分缕析，更是煞费苦心。但稍闲暇，即手不释卷，苦读不息。为了写好字，他常常秉烛三更，趴在半高不高的小几子上，蹲不蹲，坐不坐地挥毫练习，数帖字成，往往是腿痠

① 见《啬翁自订年谱》。

筋麻。

光绪十年(1884年)庆军要撤离朝鲜回国。张謇因处理善后问题表现出的杰出才能受到上级的重视,朝鲜欲以“宾师”的待遇劝他留下,北洋大臣李鸿章、张树声和吴长庆三人联合上书推荐他在朝中任事。但他觉得自己功名未就,坚辞不受,决计靠自己的努力博取前途。同年七月,张树声在奥督任内,又一次延请张謇前去任事,他仍然婉言谢绝了。故有“南不拜张北不投李”之说。

光绪十八年(1892年)春,张謇第三次会试落第,引起不少人的同情。工部尚书、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及有关重臣要留张謇管国子监南学,对他说:“南学的诸生愿为你捐纳学正官,留管学事”。并着李洛才亲往劝留。照常情,张謇年已四十,考进士屡试不中,以后有没有希望很难说,有此机会正是求之不得,但他仍是咬紧牙关,“峻词以拒”。他说:“南学诸君,情施于过当,势近于劫持,……亲在望而成进士,不成进士,依旧归去。生平志事,即此较然,毫发不可自昧,幸为坚谢申仲,转告诸君:以君子爱人,容匹夫之立志”^①。

此次不中,按照常规,要四年后,即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方可再考。光绪二十年甲午(1894年),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,加一次开科取士,称为“恩科”。天下举子得此良机,无不跃跃欲试。可张謇

① 见《啬翁自订年谱》。

因连考不中，觉得把握不大，尚在踌躇之中。他的三哥张謇在江西为官，写信给父亲，叫父亲令张謇去应考。张謇奉父亲严命，前往京城赴试。初考，中了第六十名贡士；复试，中了第十名。主考总裁翁同龢早就赏识他的才华，并有心奖掖这位乡里的后起之秀。四月二十日殿试时，他怕“誊录”时把考卷搞错，就吩咐收卷的官员坐等张謇交卷，并命令他将这份考卷直接送到自己手里。不一会，翁同龢收到了张謇的考卷，审阅之后，十分满意，立即提笔批了几个大字：“文气甚老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！”二十二日殿试，考以河渠、经籍、选举、盐铁等项专题。张謇引经据典，论述透辟，文辞古朴畅达，成绩优异。众主考官经过争议，最后一致同意翁同龢的意见，将张謇列为第一名进士。二十四日清晨，张謇以一甲一名的身份被引至乾清宫西暖阁拜见光绪帝载湉。翁同龢在一旁介绍说：“张謇，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。”二十五日，太和殿举行传胪仪式，张謇、尹铭绶、郑沅三鼎甲在庄严肃穆的鼓乐声中朝见皇上。照清廷惯例，新科状元张謇被钦授为翰林院修撰。

张謇苦学成名，但并不以此自傲。他夺魁之后，昔日的一班同窗好友于南通建造一亭，取名“果然亭”，寓意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果然功名到手。可后来修理时，张謇亲自改为“适然亭”，暗示着不在沽名钓誉上下功夫，并手书一副楹联：“世间科举与风汉，槛外云山是故人。”他后来辞官南归并屡召不应，安于乡间之间办实业，便也是很好的说明。

三、力主抗战

张謇本以为中了状元便可以“为中国伸眉，书生吐气”^①了，然而帝国主义的炮火却打碎了他的美梦。就在这年七月，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。

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，它和残余的封建经济以及天皇制的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，对外特别富于侵略性。1869年，明治天皇颁布“御笔信”，叫嚣要“开拓万里波涛，宣布国威于四方”。所谓“开拓万里波涛”的第一个实际目标，就是侵略一海之隔的近邻——朝鲜和中国。1882年6月，朝鲜发生“壬午兵变”，张謇为吴长庆代拟了一份《朝鲜善后六策》的奏疏，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，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抗日主张，可却被身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斥之为“多事”，这个奏疏中的许多有益建议也被束置高阁，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防范措施。这样就给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机会，他们趁朝鲜发生内部动乱之机，以“干涉兵变”为借口，派出军队，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，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《仁川条约》。日本除得到大宗赔款而外，还取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利。由此，侵略的魔爪向前伸

^① 见《张季子九录》。

进了一步。

1894年6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。日本趁机派遣大量的军队进驻朝鲜，对中国按约常驻朝鲜的一千五百名清兵形成鲸吞之势。战争一触即发，国人无不忧心如焚！

就在这种国势日下、战争阴影日益逼近的情况下，清朝的统治者却在一味地寻欢作乐，醉生梦死。慈禧太后一心想保持虚假的和平局面，好在甲午年歌舞升平庆贺她的六十大寿，以便借机作威作福，扩大权势。她为自己的享乐，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，挪用海军军费五百万两银子去修建颐和园。在对日本的交涉上，为李鸿章卖国投降撑腰，在“每有一次构衅，必多一次吃亏”的投降主义理论支配之下，一再妥协退让，避战求和，训令中国军队“静守勿动”，幻想着“我不先与开仗，彼谅亦不动手”。

可是，日本侵略者却加紧了各种军事部署，不断对清军挑衅。7月25日，公然不宣而战，在丰岛海面和朝鲜的牙山同时向清军发动进攻。

当时，朝中分帝（光绪）、后（慈禧）两党。帝党主战、后党主和。翁同龢、李鸿章分别为两派的首领，光绪载湉和西太后那拉氏分别为他们的后台。各派之下都有一班谋臣策士，各拥其主，推波助澜，使党派纷争愈演愈烈。李鸿章掌握着兵马大权，身边都是一班权奸大猾，特别是西太后老谋深算，心毒手狠，操纵着实际权力，使得主和派的力量无形中占着优势。但是，面对日本甚嚣尘上的侵略气焰，有识之

士无不义愤填膺。张謇预感到大清帝国将遭瓜分的危险，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：昔日的科场奋进，主要是为了改变个人受轻侮的地位，以图改换门庭，光宗耀祖；今日更感到要为国家、为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着想，要时刻以“雪国耻”为念。因此，一腔热血早已不可遏抑，常在翰林院慷慨陈词，呼吁抗战，大力宣扬“士苟以洗国耻、觉民智为心”。当时，同是江苏籍的翁同龢正担任军机大臣，张謇激情满胸，常去走动。每当谈起时局，则“声泪交下矣”！朝廷抗战的决心迟迟难下，张謇积极为翁同龢出谋划策，劝他直陈皇上，迅速下令开战。翁同龢深受张謇热情的感染，主战意志更加坚定，如张謇所请，竭力敦劝光绪皇帝对日还击。光绪帝采纳了主战派的建议，大力推行抗战路线；主和派出于全国人民的压力，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变措施。最后，清政府终于在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。

可是，由于主和派操纵着实权，在投降主义路线指导下，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都连连失利。李鸿章为保持个人实力，不顾国家危亡，命令他的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港内“不得出大洋浪战”；又下令陆军“可守则守，不可则退”，公然自撤藩篱，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于外敌。这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公愤，翰林院群情鼎沸，人人卷衣捋袖、咬牙切齿，痛斥权奸误国。他们三十五人联合上书弹劾李鸿章，要求将这卖国元凶严惩不贷！

李鸿章权倾朝野，炙手可热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

亡。当时朝中有句话,叫做“要做官不能得罪李鸿章,要做大官更不能得罪李鸿章”。张謇身为新科状元,功名前程全在这些“铁腕人物”的翻手覆手之间。按照官场陋习,张謇这类六品修撰,正该敲门求荣,努力巴结,哪里还敢公然作对。可张謇出于爱国热情,全然不念个人可能遭致的官场厄运,除与翰林院同僚联名弹劾李鸿章而外,又根据自身的感受,加上刚从朝鲜回来的袁世凯所提供的最新材料,独自写成了一本《呈劾大学士李鸿章》的奏疏。这本奏疏,从光绪八年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处理造成“我有自腐之机,敌乃有可乘之隙”入手,一件件,一桩桩,历数其种种不可宽容的罪状,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直隶总督李鸿章,自任北洋大臣以来,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,无一不坚持和议。天下之人,以是集其诟病,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,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,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,李鸿章一人而已。”他以大量的事实,犀利的笔锋,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李鸿章种种卖国行径,淋漓尽致地勾勒了他的可耻嘴脸:“试问以四朝之元老,筹三省之海防,统胜兵精卒五十营,用财数千万之多,一旦有事……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,以善可和之局。稍有人理,能无痛心!”继而严厉痛斥:“李鸿章非特败战,并且败和!”要求皇上削夺其北洋大臣的职务。

这篇奏疏,无疑是一纸讨李的檄文,击中了卖国求荣者的要害,抒发了人们对投降派的愤恨。李鸿章经此弹劾,在国人面前更加臭名昭著,在政治上开